

为经营困难企业解燃眉之急，帮百姓解决遗产继承纷争……

有纠纷？不打官司也能解！

2008年，我国着手开展“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2012年，民事诉讼法从立法角度提出了调解原则，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开始逐步运用到司法实践中。调解工作在缓解办案压力、促进案件分流、灵活高效化解纠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民事纠纷。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事纠纷数量激增，商事纠纷调解急需破题。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今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其中诉前调解案件收案906万件，同比增长12.3%，诉前调解成功率72.27%，同比增长3.47个百分点。亮眼的数据背后定有生动的故事。近日，记者走进市北区司法局，探访诉调对接、多元解纷帮助企业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事的精彩故事。



慧勤调解员。(从左至右分别为：武登锐、杜润东、李玉林)



慧勤民商事调解中心设立在市北法院。

息诉止讼解纠纷 避免诉累，没有“输家”

市北区一家新媒体公司与威海的一位网红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每天下午直播两个小时，并发布才艺短视频，待账号流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开启直播带货。但是上个月该网红在没有事前告知的情况下停播十多天，已经违反了双方的约定。该公司将该网红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按照现行诉调对接机制，该案在立案前被分到了慧勤民事调解中心，由慧勤律师事务所武登锐律师主办。在征得原告同意后，武登锐联系被告，被告表示，连日来直播没有收益，便停播了，并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双方都愿意接受调解，说明他们都想避免诉累，尽快结束纠纷。主要争议就是赔偿金额。原告前期有直播器材的投入，其索赔底线是‘保本’，但是根据合同计算，被告应付违约金5万元。”武登锐表示，经过多次与双方沟通，双方就赔偿金达成一致，被告支付原告3万元。前两日，原告从威海来到青岛，双方到法院做了司法确认，案结事了。

“双方如果有一方不接受调解，或者调解失败，便进入诉讼程序。诉讼成本首先是时间成本，一个新媒体公司在全国各地聘请主播，经常会有产生违约的情况，如果每起违约都要通过诉讼解决，必然耗费大量时间整理证据、应对开庭。而通过前置调解程序，达成协议，虽然会做出一定让步，但避免了诉累。同时，被告也避免应诉，减轻差旅负担，并且避免败诉风险。”武登锐表示，这样不用打官司，没有“输家”，实质性化解了矛盾纠纷。



市北法院诉前调解流程

优化营商环境 避免合作伙伴对簿公堂

“目前，案由为合同纠纷、金融借贷、家事财产纠纷、物业纠纷等案件事实清晰、权利义务明确的案子在立案前，会分配到调解中心。每件案子的调解期限为1个月。我们拿到案件，在分别征得原告和被告同意后，借助线上调解平台，向双方发调解码，被告凭码进入系统后，可以查看诉状和证据。诉前调解有事实依据、有权威性，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解，成功率高。”慧勤民事调解中心杜润东律师表示。

一家建材企业长期与一家客户开展多个项目合作，但因其中一个项目客户拖欠款项200多万元，长期垫资致其陷入经营困难，工人催工资、材料商催欠款。万般无奈之下，这家建材企业准备起诉这家客户。按照前置调解程序，调解员李玉林律师接手。“原告明确表示，不想与被告把关系搞僵，不想破坏合作关系。我们介入后，联系到被告，最终调整付款账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解决了这家建材企业的燃眉之急。而且双方其他合作项目正常进行，并未受影响。”李玉林表示。

近几个月，李玉林用“灵活分期付款”的调解方案化解了多起企业间债权债务纠纷。一家医疗器材供货商，长期向省外一家医疗机构提供器材，后因为该医疗机构经营困难，拖欠其50多万元货款近两年。通过诉前调解，李玉林多次与双方沟通，达成18期分期付款解决方案。一家玩具机械供货商，长期向一家教育集团提供玩具机械，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及时付款，也是在李玉林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40多万元的应付款分两年8期付清。“用调解手段解决商事纠纷，调解员作为居间人传递双方难处，争取一个最大公约数，既解企业燃眉之急，又避免合作伙伴‘撕破脸，法庭上见’，让双方当事人第一时间有效解决纠纷，节约司法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李玉林说。

记者从市北区司法局获悉，2021年11月以来，市北区设立了4个民商事调解中心，与市北法院建立对口联系机制。统计数据显示，四个调解中心之一的法苑民商事调解中心自成立以来参与调解案件标的额近2.5亿元。诉前调解工作依托互联网+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打破区域、部门和层级信息壁垒，对于化解商事纠纷、优化营商环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市北区司法局工作人员表示，设立商事调解组织，发挥了多元化解纷机制在诉源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高效的解纷服务，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诉前调解有技巧 专业打底，阅历是“秘诀”

八旬刘先生二婚近30年，于去年冬天去世，留下一套房子。其老伴王女士表示刘先生有遗嘱把房子留给她。但是刘先生一婚的两个孩子表示其父亲经常向他们诉苦，与王女士过得不开心，甚至他住院期间，王女士不管不顾，都是孩子们在照顾。但刘先生始终没向孩子提遗嘱的事，孩子认为遗嘱可能是假的。

王女士委托律师起诉了孩子，诉求其配合房子过户。该案件分到了李玉林手上。“调解员的工作首先是倾听，我每天都要跟双方打一个多小时电话。让他们把怨气发泄出来，调解工作就好开展了。”李玉林表示，刘先生的两个孩子年近50岁，老人二婚后30多年没有关照过孩子，但是孩子尽到了赡养义务。而王女士跟刘先生一起生活了30多年，她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居所继续生活，并表示愿意支付现金补偿。

“民事纠纷，尤其是家庭继承，说到底就是钱的事，就是‘讨价还价’。策略很重要，要给调解工作留有余地，不然很容易走进死胡同。”李玉林表示，调解的金额从10万元到15万元到18万元再到20万元，来回“拉锯”两周才确定。最后李玉林陪着王女士去银行打了款，又约双方到法院做了司法确认，再陪王女士去房产交易中心过户。这起案子他忙活了整整一个月。

李玉林表示，这起继承纠纷的关键点就是补偿金额，数额要合情合理合法，既要让双方看到调解成功后的希望，又要留足讨价还价的空间。李玉林虽年龄步入中年，但却是一名“年轻律师”，刚转行干律师一年多，之前大学毕业后干了20多年的销售工作，在保险行业干过培训，积累了丰富的人际沟通交流经验。

武登锐也是刚执业两年的“年轻律师”，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后，长期在深圳做黄金销售业务。而杜润东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做了几年酒水生意，回到青岛后做了几年的招商工作，“前期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阅历，再转行干律师，干调解员，得心应手。”杜润东说。

“目前我们每人每月处理100余件案子，综合调解成功率能达到3成，折合每天每人能调解成功一起案子。调解费是诉讼费的40%。比如诉讼标的1万元，诉讼费是50元，调解成功后调解员收入20元，和律师费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杜润东说，想干调解员，干好调解员，就是出于律师的初心，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